

在外语大学学中文有何不一样——

外语院校,为什么要发展中文学科

□ 杨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当今和未来社会经济所需要的人才,不仅需要建设“新工科”,也需要建设“新文科”,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高等教育的振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新文科。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不断丰富和强化外语学科内涵发展的同时,实现外语学科和中文学科之间的协同交叉融合?如何站在时代的思想制高点上,以一种因应时代难题和困境的“尖端论述”姿态汲取中外理论资源,彰显新时代人文教育理念?如何促进中文学科在教学内容、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评价机制以及培养模式等多层次上的深化改革与创新?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探索。

1 新文科建设应体现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

文科教育是培养有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人,是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文化,是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国家软实力需要新文科,造就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文化繁荣需要新文科。

“新文科”就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指出,从世界来看,世界的新变革呼唤新文科建设;从中国发展来看,新时代呼唤新文科;从教育改革发展来看,教育方针呼唤新文科建设;从方位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应置于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不仅要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的制定。由此看来,在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是我国“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新技术改变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式;新需求要求文科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追求创新与卓越;新国情促使文科应具备中国特色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因此,新文科是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的自我革新,其建设应体现三个方面的特性:战略性、创新性和融合性。

2 外语学科再提升需高水平中文学科支撑

注重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扩展,为外语类高校中文学科“借力”优化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和学理支撑。

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学科主干研究领域确定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新确立的五大学科研究领域,扩大了外语学科原来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的内涵,凸显了外语学科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同时,也对外语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外语院校多学科发展已成为一个大趋势,但是无论是“专业+外语”还是“外语+专业”都还处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的学科融合式的联合培养还很少,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学科融合还比较单一。需要构建新型的培养机制,打造高质量的课程,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组建导师组联合培养,使高端外语人才具有坚实的人文根基,深厚的人文底蕴,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外语院校的“外语”和“中文”学科,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老一辈外,再走向世界,了解其他文明的时候,才能深化对自身文明的理解,也会深化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全球广度”是指要有从中国看世界的胸怀,是以专业的眼光和深度探究世界。而“人文高



● 外语专业的专业性,需要有特定的专业课程学习。缺乏人文视野、基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孤立地进行“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训练,很难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专业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 外语院校多学科发展已成为一个大趋势,但是无论是“专业+外语”还是“外语+专业”都还处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的学科融合式联合培养还很少,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学科还比较单一。



大学图书馆

光明图片

3 “拆墙”“入流”“争先”,外语院校要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立足新时代,迎接新挑战,创造新未来。外语院校要为培养“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中国理论的创新者”“中国未来的开创者”做出积极的贡献。

目前,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基本处于“外语院校学科建设主体之外”和“中文学科之支流”。国内还没有一所外语院校的中文学科设有一级学科博士点,这不但直接影响中文学科在外语院校的正常发展和成长,而且与外语教育应注重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不相适应。

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其强调知识性和价值性的学科属性在高校育人育才的工程中肩负着重要任务,是构建和提升高校整体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恰如其时,外语院校的中文学科发展迎来了很好的机遇:一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一是“新文科”服务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的需要。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外语院校人才培养要求,推进中文学科建设不断升级?

其一,要“拆墙”,彻底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中文学科与外语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文学科为外语院校人文教育起着“引擎”作用,它为学校提供人文素养提升的课

程与师资支持,不仅有利于中文学科体现出鲜明的学科特性,也可以在校内形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动提升的良好局面。新时代不仅呼唤会讲中国故事的人才,更需要能够讲中国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外语院校应注重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真正融合,有利于专业优化、课程提质和模式创新,为培养此类人才创造条件。

其二,要“入流”,即要提升学术内涵,有充分反映中文学科理论创新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争取进入中文学科的主流。这就要求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建设要提升教育教学的时代性、学术性和针对性,注重内涵,凝练学术方向,切实适应中文学科自身发展更好更远的目标,更加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文学科体系,培养中文学科优秀创新人才的重任;更加承担起在新科技迅猛发展形势下探索学科边界拓展、专业结构更新、教学范式转型、学习方式转变的重任。

其三,要“争先”,即在“新文

科”建设中争得一席之地,并大力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方面,创建新型学科,拓展学科发展空间。适应国家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在现有学科基础上通过整合重组,探索跨专业中文学科“新文科”建设,创建新型研究生专业和复合型本科专业,为中文学科寻求新的增长点,拓展学科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根据外语院校的办学特色,中文学科的国际化将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这个学科一个新的生长点,新的发展空间。对外而言,可借助广泛国际交流和20余所孔子学院建设优势,拓展与海外高校的合作研究和研究生合作培养,促进中文学科在内涵、外延乃至从课程体系、授课内容到讲授方式方法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秉承“新文科”建设、“双一流”建设的新时代东风,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建设要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三大重要抓手”,积极加快推进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链接

高水平母语教学是高水平西学研究的基础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始建于1951年,经过70年的努力,北外中文学科已设有一级学科硕士点,开设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学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6个学术型硕士点和汉语国际教育1个专业硕士点,同时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学3个博士点。此外,北外中文学科在综合类大学中文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高水平母语教学是高水平西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前提,中文学科不能甘居外语类高校的“配角”,而应勇担时代重任,成为学科发展及学术团队建设的核心成员。其

次,外语院校中文学科要结合国家战略和外语教育创新自己的学科建设,要与国内综合类或师范类院校的中文系形成“错位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家比以往更需要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和发展。外语院校中文学科以丰富的外语教学科研资源为依托,以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视野为特色,一直处在“会讲中国故事”的研究和实践的前列。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中文语言文化学院,可追溯到1965年广州外国语学院的中国教学组。2005年3月,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成立。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化系和对外汉语系,

开办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汉语言(高级涉外文秘)、汉语言(涉外文化管理)和汉语国际教育4个本科专业方向。拥有比较文学研究博士点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化传播与媒介等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学院设有汉语国际教育中心,专门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工作。学院着力打造华南地区国际化中文人才培养高地,培养“双高”(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高)、“两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实践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创新型中文人才。

新的生产模式更加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建立在跨学科、多样化的基础上。因为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单一学科、单一方式就能完成的,需要多元整合与跨学科的研究。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全球化进程在近年来有些停滞,但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与经济上的一体化不同,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多样化,全球化将多元文化汇聚在一起,文化多样化的问题因而凸显出来。培养能够适应文化多样化要求、自如地在不同文化间穿行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迫切任务。加强跨文化人才培养,提高我国青年的跨文化能力和全球胜任力,是我国高校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包括新文科、新工科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跨文化能力是现代青年的基本能力,是进行文明对话的基础

跨文化能力有着丰富的内涵,既包括多语言能力,也包括文化理解能力、文化整合能力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与合作的态度。跨文化能力已经成为现代青年的基本能力,是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2016年,“国际理解”被列为中国学生核心素养“责任担当”的内容之一。因为有了理解才有感同身受,才有彼此欣赏和相互尊重,才能推己及人,自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部落主义,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未来能够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人,必定不是狭隘封闭、傲慢自大的人,而是有着高度“国际理解”能力的人。通过跨文化培养,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本国与他国、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增强国际理解和跨文化能力,才能自如行走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国际交往和文明对话。

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消费市场,随着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合作将会更加深入。大到两国政府间的战略合作,小到企业间的商贸洽谈,熟练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熟知彼此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和制度都是开展合作的最基本要求;如果讲要促进更深更广合作,那就更需要了解彼此的思维模式、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这些更深层面的文化,从而把握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这些显然都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来完成。

中国社会对跨文化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对跨文化人才培养有着独到的见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和”文化既是跨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跨文化的实现方法和价值追求,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而不同”,是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能够包容差异、心平气和地共存而非对立。在文化交流加深、不同文明冲突不断的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应该继续传承传统文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深得中华文明精髓的“现代君子”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摆渡者”。

跨文化人才培养有助于涵养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交流是一个对等的概念,没有你才有我,没有自我,就没有真正的交流。文明交流也是如此,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在文明的交流上,没有大小强弱之分。跨文化能力意味着对文明交流的方式也有着良好的把握:既有能力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上观察他文化,又有能力以其他文化的视角来反思自己的文化,在这种观察与反思中达成对不同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而培养出真正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一段落后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自信心;通过跨文化学习和比较,有助于我们的青年把这一段历史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放到更广阔、更深刻的背景中去思考,当代青年对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的文化之根和今天的成就会有更深刻的敬意。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跨文化人才培养有助于涵养青年的文化自信,增强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自

跨文化,这个能力不能缺

在不同文化间穿行——

□ 胡娟 陈嘉雨

信心。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理解和跨文化能力,才能自如行走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国际交往和文明对话。

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把握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不仅包含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还包括中国当下的新发展、新成就。立足中国国情,了解中国故事,有助于我们的青年一代知中国、爱中国,成为中国故事的乐于讲述者和善于讲述者。当前,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外总是有一些持中国“威胁”论者对我们横加指责。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崛起的真正意义、准确讲述中国,还需要我们培养的一代新人不仅内知国情,而且外知世界,能够洞察对方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用对方的话语体系或能够接受的方式与之对话,增强对话效果。

跨文化人才培养能够开阔人的视野,推动知识创新

通过跨文化培养出来的开放包容品质,将极大地开阔青年的视野,活跃青年的头脑,增加青年接受不同事务的弹性和能力,帮助青年成为有跨界思维的人,对推动知识创新有着极大的助力。因为广义的跨文化概念,不仅包括跨国别、跨民族文化,也包括跨学科、跨专业文化,以及其他跨文化形态。

当今知识创新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学者吉本斯等在社会观察中发现,当今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转型,从传统的“模式1”——单一学科或多学科的、同质性的、强调共识的、主要在认知语境中产生的、以大学为主要场所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向了跨学科的、异质性的、更多反思性、在应用情境中进行的以及成员、场所和协作方式多样化的“模式2”。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新的生产模式更加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建立在跨学科、多样化的基础上。因为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单一学科、单一方式就能完成的,需要多元整合与跨学科的研究。

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发展瓶颈,是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原始创新不足。解决这一瓶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做好跨文化人才培养,为创新发展做好人才准备。

(作者胡娟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陈嘉雨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